



主编 / 王洛林

中国服务业 开放与发展： 特点与区域分析

执行主编 / 裴长洪
荆林波

The Opening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and Regional Analysis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主编 / 王洛林

中国服务业 开放与发展： 特点与区域分析

执行主编 / 裴长洪
荆林波

The Opening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and Regional Analysis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服务业开放与发展: 特点与区域分析/王洛林主编.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9.8

(全球化与中国系列丛书)

ISBN 978-7-5096-0746-6

I. 中… II. 王… III. 服务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F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9407 号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电话: (010)51915602 邮编: 100038

印刷: 北京银祥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组稿编辑: 贾晓建

责任编辑: 贾晓建 曹 靖

技术编辑: 黄 铄

责任校对: 超 凡

720mm×1000mm/16

18.25 印张 338 千字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书号: ISBN 978-7-5096-0746-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
负责调换。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68022974 邮编: 100836

总 序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全球化进程呈现出明显的加速发展势头,全球化的浪潮已经席卷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世界各国(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也日益紧密,国际经济、政治的格局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一员,一方面分享着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冲击。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增强和提高,中国对世界经济和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对全球化的进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如何认识全球化与全球化中的中国因素以及全球化与中国的关系,已经成为当代知识领域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课题,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经济学科片、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片和社会政法学科片(现在的经济学部、国际研究学部和社会政法学部)的部分专家学者于 2004 年中成立了“全球化与中国”课题组,计划用 5 年时间(2004 年中至 2009 年中)从多学科的角度对全球化与中国未来发展的关系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不仅研究全球化进程对中国经济、社会、法律和文化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也分析中国对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以及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并就中国如何参与全球化进程、如何因应全球化挑战等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全球化与中国》系列丛书就是在上述课题研究成果基础上编纂完成的。

按照立项计划,课题将分为 3 个部分,10 个专题。

第一部分是综合研究,包括两个专题:一是全球化的理论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二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第二部分是经济问题研究,包括 4 个专题:一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三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金融改革,四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三农”问题。

第三部分是社会、法律和文化问题研究,分别从社会、法律、文化角度分析全球化对中国城乡产生的影响及反应,也包括 4 个专题:一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农村健康和扶贫政策研究,二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社会—文化变迁,三是全球化与中国法律,四是全球化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影响。

以上各专题都将对该领域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专题研究一：全球化理论与未来发展趋势。本专题侧重于全球化的理论研究，并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全球化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规律性的展望。回答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的实质及主要内容是什么？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全球化的度量方法是什么？全球化的条件、基础、动力、载体是什么？全球化的现实后果是什么？对各国人民的福利会带来哪些影响？类似于气候变暖这样的“全球性问题”对人类社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也将是本专题的一项重要内容。

专题研究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本专题主要回答以下问题：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哪些变化？未来的变化趋势如何？特别是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结构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结合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本专题就中国如何参与全球化以及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做出进一步的研究。

专题研究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宏观经济。本专题将在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做出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着力回答以下问题：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及宏观经济波动产生了哪些影响？怎样认识全球化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内在机制以及中国经济与全球化的契合点？并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做出展望。

专题研究四：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外向经济的发展。本专题集中研究中国的外资引进、对外贸易及中国对外投资问题。全球化为中国的外向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促进了中国外向经济的快速发展，解剖其中的内在动力、内在机制就成为深入认识中国外向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本专题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外资引进和对外投资做出了全面细致的分析。

专题研究五：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金融改革。本专题的主要研究内容，一是对国内外有关金融全球化的理论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和简要评述；二是探讨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机理，综合考察金融全球化对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影响及中国因素对经济与金融全球化的影响；三是提出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金融业的效率标准与改革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快以市场化为导向的金融改革建议。

专题研究六：全球化下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似乎取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也为其发展提供了便宜的土地。在中国目前的制度安排下，全球化既给农村群体带来了利益，也造成了损失，甚至使一部分村民成为全球化的受害者。针对这一问题，本专题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全球化对农村群体的有利之处是什么？不利之处又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本专题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提出一个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的农村发展

思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专题的主要研究内容:一是对现有发展思路下的全球化影响做出评估;二是明确农村群体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挑战;三是探讨新的发展思路中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及个人在其中的责任与功能,使受到损害的目标群体的特殊需要能够优先予以保障;四是评估实现新的农村发展思路的成本及资金来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途径;最后,就这一新的发展思路对全球化的可能影响做出评价。

专题研究七:经济全球化中的农村健康扶贫政策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农村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已经解决。即使按照目前中国明显偏低的贫困标准,中国也还有两千多万的农村贫困人口。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公共卫生几乎成了国内市场化 and 全球经济竞争的牺牲品。中国各级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追求远胜于对于健康领域的关注。而健康,还有教育,无疑是影响贫困人口脱贫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中国政府有必要针对市场化和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调整国家的卫生政策和扶贫计划,通过投资于贫困人口的健康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并借此获得减少贫困的效果。本专题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以便为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下的农村健康扶贫行动提供政策建议:一是沿着贸易自由化—药品价格决定—贫困人口常用药物的可及性—劳动者健康状况—非农就业—家庭收入—家庭消费与投资这样一个线索,探讨经济全球化对农村贫困人口生产生活的影 响;二是考察现行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在贫困群体享受医疗服务及维护其家庭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三是沿着农村工业化和农业市场化—环境污染—与环境相联系的疾病和健康问题—农户疾病负担—社区环境成本这一线索,探讨经济全球化对农村人口的健康、家计和社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四是考察现有的环境保护制度、疾病预防和控制制度、污染受害者法律保护制度对维护农村公共健康安全和社区环境安全的作用。

专题研究八: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法律。全球化使中国的法律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一影响正在从三个层面逐步展开:一是具体的法律制度措施层面;二是立法体制层面;三是法律观念与法律文化层面。本研究将主要围绕这三个层面就全球化对中国法律所产生的影响的表现特征、作用机制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进而提出符合我国需要的制度选择建议。

专题研究九: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社会—文化变迁。本专题研究的是中国后发地区(主要是西部地区)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文化变迁所做的策略选择与实践过程。主要研究内容:一是探讨后发地区在全球化过程中具有地方特色的尝试与实践,力图从中摸索出一条既能利用全球化机遇,又能激活本地社会文化资源的发展道路;二是通过个案研究发现带有共性的问题,在经验层

面对地方的实践予以概括；三是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基层实践的意义及其政策含义。

专题研究十：经济全球化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本专题主要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冲击，以及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与价值观念的重新塑造；二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三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文化的发展战略。

上述各项研究成果均将集集成册，同时，以上述研究为基础形成的专题研究报告及课题研究总报告也将汇集成册，一并陆续出版。

我们希望，《全球化与中国》系列丛书的出版，能够加深我们对全球化的了解，提高我们对中国发展与全球化关系的认识；我们也同样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有助于增加世界对中国和平发展的理解。

“全球化与中国”课题研究和《全球化与中国》系列丛书的出版，自始至终都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财政支持，对此，我们深表感谢。我们希望，本系列丛书能够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又一历史见证。

最后，诚恳希望广大读者对本丛书的不足与错误提出批评指正。

王洛林

2007年10月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特点与理论分析	1
一、集聚的产业化效应：城市化发展的双重经济含义	1
二、组织创新的分工效应：商品市场功能及其提升	6
三、外包的商业模式：专业分工与供应链管理	11
四、总结	15
第二章 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特点与趋势	17
一、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概念	17
二、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进程	18
三、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及其主要特点	21
四、中国服务业利用外商投资及其主要特点	25
五、服务业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机遇	29
六、服务业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建议	31
第三章 服务密度的地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	34
一、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服务密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34
二、各省的服务密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42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47
第四章 制造业与服务业区域融合：对京津冀地区的一项分析	50
一、制造业与服务业区域融合的机制	50
二、京津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优势与区域分工	51
三、京津冀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的重点地域	55
四、京津冀制造业和服务业区域融合的模式创新	56
五、促进京津冀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对策	58
第五章 粤港生产性服务业的合作现状与展望	60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60

二、粤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及其特征	61
三、粤港生产性服务业的合作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72
四、加强粤港在生产性服务业合作的重要性和需要突破的障碍	80
五、深化粤港生产性服务业合作的思路与重点领域合作	84
六、推动粤港生产性服务业合作的保障措施	89
第六章 珠三角地区服务业的开放与发展	92
一、珠三角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历程	93
二、珠三角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及问题	94
三、珠三角服务业开放与发展总体状况	101
四、珠三角零售业的对外开放与发展	107
五、物流业的对外开放与发展	114
六、会展业的对外开放与发展机遇	123
七、金融业的对外与进一步发展	130
八、珠三角房地产业的对外开放	137
九、珠三角服务业进一步开放的趋势与建议	143
第七章 关于长三角 16 城市服务经济指数的研究	147
一、排名及简要分析	147
二、计算方法和数据采集	151
三、聚类分析与首位度分析	151
四、意见和建议	153
第八章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下的宁波服务业研究	160
一、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下的宁波服务业现状	160
二、宁波与长三角城市的服务业发展比较	172
三、宁波服务业发展容量分析	178
第九章 环渤海地区服务业发展与开放	183
一、环渤海地区界定	183
二、环渤海地区服务业的发展	184
三、环渤海地区服务业的开放	191
四、总结	194
第十章 关于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实证研究	196
一、北京市服务业发展现状分析	196

二、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总体分析	205
三、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行业分析	211
第十一章 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220
一、变量选择和模型构建	220
二、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221
三、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分析	224
第十二章 西南地区服务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230
一、发展服务业是加快西南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230
二、西南地区服务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232
三、西南地区服务业竞争力分析	234
四、西南地区服务业的行业结构分析	243
五、西南地区发展服务业的战略选择	245
第十三章 黑龙江省流通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分析	249
一、搞活流通、扩大内需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关键	249
二、搞活流通、扩大内需的主要途径	253
三、搞活流通与扩大内需所需的政策及保障	256
第十四章 区域信用成长研究	259
一、区域信用及其成长	259
二、区域信用成长机制	261
三、区域信用成长阶段	266
四、区域信用成长趋势	268
第十五章 经济发展与结构变动中的浙江服务业	270
一、问题的提出	270
二、文献回顾	271
三、方法和数据	272
四、实证分析及结论	273
五、原因分析及启示	277
后记	281

第一章 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特点与理论分析

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总体上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有了长足进步，而且积累了中国的特殊经验。总结这种宝贵的经验并把它上升到理论层面来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在我国特定国情条件下如何把握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规律，并如何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经验。

一、集聚的产业化效应：城市化发展的双重经济含义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发达经济体已经经历了两次显著的结构变化，即工业革命导致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以及“服务革命”导致的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变。与经济结构变化相伴随的是城市化内涵的扩展和演进方向的嬗变。工业革命提供了现代城市形成的历史机遇，现代城市也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成熟的标志，因此现代化初期的城市发展与工业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开始了第二次变化，到80年代中后期，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比重普遍超过60%，城市经济逐渐从以工业经济为主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服务业成为城市经济的主导产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国家工业化的带动下，形成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不仅原有的行政中心城市和消费型城市转变为工业城市，而且涌现了一批由资源开发和工业发展直接带动形成的单一工业型城市。工业发展和人口聚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服务业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城乡分割和所有制分割的体制障碍以及管理权限高度集中，我国工业发展和城市发展都受到严重制约，当然服务业的发展就更落后。改革开放最初的十余年间，我国城市化发展出现了两个新的轨迹：一是由于城乡分割和所有制分割的体制障碍被打破，城市国有工业向乡镇集体工业扩散和转移；由于管理权限下放，大批国有工业企业的隶属关系下放到中小城市当地政府，形成了工业化的加速度发展以及与新体制相适应的城镇化的新发展。二是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中，最初是在经济特区和沿海

开放城市，后来在沿边、沿江以及全国的开放城市中都建立了大量面积不等、行政层级不同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形成了依附于原有中心城市的新的工业聚集区，由此带动了工业的集聚和搬迁，大大扩展了原有中心城市的空间、人口和经济容量，为原有中心城市的改造提升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在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推动下，我国服务业也呈现较快发展。1992年我国城市化率不足30%，2007年提高到43%，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不足35%提高到40%，服务业就业人员比重从不足28%提高到45%。^①尽管如此，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落后仍是明显的。目前，全球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平均水平达到60%以上，主要发达国家达到70%以上，即使是中低收入国家平均也达到43%；吸收劳动力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比重普遍达到70%，少数发达国家在80%以上。而且，我国服务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以知识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也严重滞后。与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路径不同的是，我国是在工业化，特别是在工业现代化必须继续完成的条件下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所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面临双重任务，既要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又要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舍此我国没有别的捷径可走，这是因为：首先，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离不开工业化，特别是工业现代化的发展。我国是大经济体，不可能像某些小经济体那样依托某些资源优势发展少数服务行业来支撑国民经济；大国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是需要以实物经济为基础并建立比较健全的产业体系，因此工业发展是所有产业现代化的前提。同样，在服务业的产业体系中，我国既需要发展消费性服务业，也需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而如果没有工业现代化的进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就没有需求和市场；反过来，生产性服务业的要素供给，特别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渐实现，却难以在消费性服务业的单一发展中获取。其次，我国工业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从所有制改革到产品生产与流通的市场化改革以及资本的市场准入等各方面条件都优于和领先于服务产品的改革和开放，这也决定了我国工业经济必然领先以及必须在工业现代化继续完成的条件下加快发展服务业的既定格局，形成了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必然趋势。再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保障，既需要以价值量衡量的增加值和收入的持续增长，也需要以实物为基础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壮大，而这些都离不开工业现代化的继续完成。

在上述既定条件约束下，我国城市化发展和演进的规律就具有了双重经济含义：一方面，城市化的发展要求工业产业的集聚，即向工业园区（各类经济

^①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等)或新的城市区域集中,也包括星罗棋布的乡镇工业企业向乡镇工业园区的集中,以构建工业产业集聚的新增长极;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发展要求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产业集聚,即向城市中心区集聚,不仅在扩大容量的城市空间中扩展,而且要不断逼迫工业撤离并填充其遗留下的空间。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实质上就是城市中心区域的经济的发展,现代都市的发育过程实质就是经济结构的转型过程。城市发展不仅产生了对服务业的最大需求和集中需求,而且为服务业发展创造了产业规模的市场基础;城市提供了服务业各种要素集聚的产生条件,特别是先进要素集聚的产生条件,引导了服务业发展的生产与技术环境以及经济外部性的发育形成。

产业集聚现象很早就成为经济学研究的课题。马歇尔(1920)用经济外部性解释了产业集聚的原因,即劳动力市场共享、专业投入品、技术服务相关支持条件以及知识外溢的经济收益。克鲁格曼(1991)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理论,分析了在规模经济、低运输费用和高制造业投入的综合作用下,工业集聚导致制造业中心区形成的发展趋势。波特(1985)从竞争优势的角度研究了产业集群现象,认为产业集群在获取信息、供应商、员工、公共物品等方面的优势使其有利于在区域和地区获得竞争优势。此前,佩鲁(1955)也曾提出过类似于区域竞争优势的增长极理论,他认为区域的经济增长来源于区域的增长极,它是位于某些区域的一组扩张中的、诱导其区域经济活动进一步发展的产业,通过它们的集聚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产业集聚、区域竞争优势等研究分析与城市化发展的研究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早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勒(1933)和勒斯(1939)就提出过城市区位论,认为城市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载体,它以社会生产的各种物质要素和物质生产过程在空间上的集聚为特征,城市化的动力来自集聚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克鲁格曼(1996)在空间经济学中建立的城市微观模型,论证了城市体系的形成与演化过程是企业、居民或消费者在市场条件下,追求各自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求解结果。克鲁格曼这个模型中的厂商或企业,无疑已经是服务型厂商或企业。那么,在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城市中,企业与居民在市场条件下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将遵循哪些基本规律呢?

(1) 土地资本化提供了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的原动力。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城市国有工业企业股份制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和推进,使城市企业和居民有了选择自有资产形态的自主权和追求资产收益最大化的可能。与商业地产紧密联系的各种服务业产生了比原有制造业利润高得多的土地级差收益;住房成为居民财产保值增值的最可靠资产,从而创造了更高的土地级差收益。土地资本化和土地级差收益逼迫制造业不断从城市中心区向外转

移,并不断吸引服务业填充制造业转移遗留下的空间,成为城市经济结构转型最主要的经济动力。原有城市中的产业工人在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的竞争中,丧失了制造业继续就业的工资优势,在经历了下岗和失业的困窘之后,大多数成为服务业从业人员和有房产租金收入的自由职业者,服务业就业人员的比重也随之上升。现代大城市早已不再有第一产业的生产活动,第二产业的生产活动也基本退出都市区,能够保留下来的只能是占用土地空间很少的一些高科技工业企业,第三产业成为都市区基本的经济活动。

(2) 经济活动要求最集约地使用土地空间。都市中心区的土地价格依据土地级差地租规律形成,日趋高昂,因此只有劳动生产率和投资回报率高的服务业才能立足,而且只有最集约地使用土地空间才能降低成本。现代中央商务区(CBD),如纽约的曼哈顿中心区、伦敦的金融城区等,就是都市经济最成熟的城区形态,它们基本上已成为人类空间最集约的经济增长地域。在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中,有所谓“楼宇经济”、“总部经济”的提法,也是反映了都市经济要求集约利用土地空间的特征,这是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创新。

(3) “经济容积率”规律发挥作用。为了最集约地使用土地空间,非生产人口居住率呈现下降趋势,这就是“经济容积率”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都市中心区最集约使用土地空间的经济含义并不是建筑学中的“容积率”的概念,建筑学“容积率”的概念是指房屋箭簇的密度,而这里讲的最集约使用土地空间是一种“经济容积率”,它要求在所能承载建房密度的空间中得到最高的经济产出。^①假如每个楼宇都是服务经济的生产车间,那么整个都市中心区就是服务经济的“工厂”,而单纯提供作为住宅的房子,就是“工厂”的“宿舍”,后者是没有产出功能的,因此它的面积会被控制在最低限度,这导致非生产人口居住将呈下降趋势。在现代化大都市中心区,特别是中央商务区,单纯的住宅面积是受到限制的,这就导致了该区域非生产人口的下降。这里的居民主要是与生产有关的人口,或者是作为具有投资象征意义的居民。因此,提高城市经济的潜力,就是提高“经济容积率”。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也就是提高每个土地单位面积的经济产出,即生产总值和税收。为了实现这个指标的最大化,应当提高“经济容积率”,降低非生产人口的居住。我国城市经济在实践发展中已经提出了税收“亿元楼”的概念,就是反映了提高土地单位产出率的要求,但是从总体上提高这个指标,只靠一个“亿元楼”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亿元楼”,这就要求提高“经济容积率”。

(4) 经济虚拟化的趋势。生产投入要求资本与知识要素密集,产出只以价值量来衡量。在都市中心区的生产投入中,货币资本投入固然是最重要的,但

^① 这种经济产出的衡量指标可以是增加值的概念,也可以是企业财务报表中的利润和税收。

体现为科技手段 and 知识要素的设备、人力资本也同样重要,因此中央商务区和“楼宇经济”实际是要求以货币资本和科技知识来替代土地资源的经济。没有足够的货币资本和科技知识,就难以实现最集约使用土地空间的目的。城市经济以服务经济为主,服务产品是主要的产出内容。但服务产品往往没有物理形态和实体外观,它的使用价值难以用数量单位来衡量,因此服务产出的衡量单位只能是价值量,这就使都市经济成为货币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生产中心,货币经济和虚拟经济也成为都市经济的基本形态。

(5) 消费的转型与升级。随着都市中心区非生产人口居住率的下降,这里的消费形态也随之转型,与居民生活消费相关的区内消费类型逐渐退居次要,或者转型为商务消费、会议消费等生产消费形态。与“楼宇经济”功能相关的生产消费以及区外消费的类型和内容不断增加,包括对中间投入品的消费,对各种相关服务产品的消费以及对知识、信息的消费将成为都市中心区的主要消费形态。即便是大型商场、百货店这类最典型的居民消费场所,也都增加了商品信息消费功能,具有了引导消费潮流、释放消费信息、提供新商品知识和商业管理信息等其他非单纯居民日常消费的特征;再加上配送服务和其他客户服务等功能,使生产性服务延伸到零售环节,从而有别于其他区域的商业零售业。

(6) 服务产业化必然扩及传统的“非经济领域”。现代城市的就业人群必然是以服务业从业人员为主体,服务业的白领和蓝领职业群体基本替代了传统意义的产业工人,成为城市经济活动的主要劳动者,而服务业人力资本构成的提高,使服务业的普通劳动与管理劳动的界限日益模糊。当现代服务业成为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领域,服务劳动者成为社会的主要劳动者的时候,服务产业化必然扩大到教育、医疗、健康救助、文化传播等传统意义上的“上层建筑”领域,使这些行业中的某一部分产业化,并可以计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否则,怎么解释这么多人的劳动如何与传统意义的工人和农民的劳动相交换呢?

(7) 公共服务部门成为就业的必要渠道。现代城市由于人口的集聚,产生了大量公共管理活动,多数是以政府管理的面目出现。公共服务是现代服务业的组成部分,需要相应的从业人员,其创造的公共产品也应计入社会总产品。公共服务范围的扩大和功能的增强是现代国家政权运作的普遍规律,也是政府职能延伸的重要方向。政府提供的大量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是第三产业的组成部分,生产提供这种产品和服务既是政府的职能,也是社会的需要,要由社会来购买。这为丰富列宁的国家机器理论认识提供了新的实践来源,国家机器中不仅存在着体现为阶级镇压、阶级统治的功能,也存在着公共管理和服务的功能,而前者功能的丧失和后者的发育成长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消亡”的表现。因此,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转变政府职能和优化政府机构的方向就是在继续保持阶级统治属性的前提下,提

高政府的公共管理和服务，生产出数量更多、更优质的公共产品，这就需要更多的生产者。所以，政府公共服务部门应当成为居民增加就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渠道。

二、组织创新的分工效应：商品市场功能及其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是从搞活商品流通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农副产品和日用工业品从计划管理转向市场调节，城乡中出现了大量农民集体与合作的流通组织，还出现了非公有制的个体户和私营流通组织。之后，城市国有商业机构和流通组织也进行了改革，大量小型国有商业企业有的改为集体经营，有的转为集体所有制，有的实行租赁经营，有的卖掉。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又对大中型国有商业企业实行了股份制改革，采用职工内部持股和定向法人持股的方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所有制的转换。这使原有高度集中垄断的商品流通体制改变成为多种经济形式并存、流通组织分散化特征十分明显的局面。到1991年底，我国社会商业企业经营机构中，全民所有制商业占4.7%，集体商业占14.1%，个体商业占81%，还有少量中外合营和私营商业；社会商业企业经营机构从业人员中，全民所有制占25.3%，集体商业占31.1%，个体商业占43.3%；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占40.2%，集体商业占30%，个体商业占19.6%，合营商业占0.5%，农民对非农民居民直接零售占9.7%（赵尔烈，1993）。

随着市场准入领域的不断扩大，商品流通领域的经营形式愈来愈多样化，商品流通组织呈现出不断分散化的趋势。如何克服商品流通组织分散化与大规模商品生产的矛盾，成为流通领域深化改革的新课题。在总结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经验的基础上，培育和发展商品市场体系，成为90年代初期以后流通领域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裴长洪，2008）。早期的一些商品市场，特别是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是自发形成的，存在设施简陋、交易品种少、运销方式原始简单等问题；政府部门借鉴和总结民间经验，出资兴建了场地比较标准、交易品种较多、交易方式比较规范以及提供工商管理、税收服务等方面内容的商品市场，成为商品市场建设的新标准，从而吸引了更多民间资本投入商品市场的兴建，商品市场不仅成为广大分散的小商户的组织者，而且成为其他服务供应商滋生的土壤和磁场，运销组织和各类中介组织、经纪人都如期而至，围绕着各种商品流通，产生了各种服务业态。商品市场成为我国商品流通制度变迁的新的载体，有其客观必然性。发达国家商品流通制度中出现的组织形式，如大型超市加连锁经营、巨型跨国商贸集团加供应链管理等

组织结构和经营形式的出现,既需要商业资本的足够积累,还需要城市化和基础设施的空前完善以及商业先进技术与管理的应用;更重要的是商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术的有效供给。这一切要素,在我国改革开放的20年后,几乎都还刚刚开始,即便到30年后的今天,这些条件还仅仅在少数大都市中初步具备。因此,我国商品流通的制度变革和组织创新不可能一步跃进到发达国家的现有模式,而需要通过土地资本化道路来创建商品市场,通过流通组织变革和组织创新来实现制度变迁,这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变革产物和创新形式,是进一步发展的起点和现实基础。

截至2003年末,全国城乡共建立了各类商品市场81017个,其中城市27006个,乡村54011个,还成立了金属、粮食等商品期货交易所3个;同时,市场交易规模和辐射领域不断扩大,通过批发市场交易的商品销售额已占全社会商品销售总额的1/3,初步形成了农副产品(含粮油)、日用工业品、生产资料的综合市场与专业市场相结合、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相结合的商品市场体系(陈文玲等,2005,第118页)。这个遍布全国的商品市场体系,构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领域的组织化载体,为政府规范流通秩序、监测市场运行和商品供求、协调生产流通与消费提供了重要条件。从微观角度考察和解剖比较规范、典型的商品市场,可以发现其模式基本是:商业地产商(市场业主)+分散小商户+各类供应商+公共服务部门。这就是我国30年改革中商品流通体制的组织创新,它不仅实现了小商户与大市场、大流通的衔接,而且成为各类各式服务业发育的重要摇篮。也就是说,商品流通的组织创新是扩大分工、延伸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道格拉斯·C.诺思(1994)曾从经济史角度分析了制度变迁的经济意义,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分工也将是一个随着制度演进而逐步演进的动态过程;同时,动态化的分工为经济因素和技术因素的变化提供了可能,这些变化又会诱发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一个最终路径是,由制度与组织的共生关系所引起的固定特性因素来决定。我国商品流通体制变迁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由商品流通组织的所有制改革加上商品市场的组织创新共生共长决定的。那么制度变迁的动力又是什么呢?科斯(1937)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过交易费用的概念,后来又对此作过延伸解释;阿罗(1969)则把交易费用解释为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张五常(1987)认为,交易成本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显然,降低交易成本就是制度变迁的最重要动力。商品市场的制度变迁不仅降低了商品流通成本,而且降低了服务业发育成长的制度成本。

考察发育阶段不同的商品市场,可以把它们大体分为三类,这也分别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发育阶段。第一类是地摊式经营的商品市场,这是最初级形态的